论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与《列宁道路》商榷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论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与《列宁道路》商榷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编者按：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这篇文章于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论和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两种观点之外，提出了目前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观点。

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主张，与社会主义革命论相似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主张超出民主主义的范围，例如要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式的国家）而非劳动者专政；两者的区别可能在于对待中小资本的态度上还是有不同，准备论要争取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其群众的支持，直接论或许要求立即消灭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主张，与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区别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领导民主革命的阶段。但这种区别因为以下两点变得不那么鲜明：一来，两者都承认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决定了革命实际的结果，这在无产阶级组织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将导致无法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二来，认为革命须从彻底民主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会反对彻底民主革命是唯一能够为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做好准备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将支持目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提法。

值得注意的是，来稿在文末提出了八条具体主张，这无疑是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对这些条文，除了在政治上我们主张劳动者专政而来稿主张（排除小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外，我们基本上都赞成。

今年以来，当代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在上一轮共运失败之后关于新一轮革命的理论准备正在进行。毫无疑问，这种讨论不论是对搞清楚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是提高左翼的理论修养，都是有益处的。

笔者认为，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述，这是理论基础；必须总结俄国**1917**年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以及德国**1918**年革命和匈牙利**191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是历史经验；还必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取代当前资本主义专制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内容。如此，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确定革命性质。

一、马恩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述

自无产阶级诞生并开展阶级斗争以来，就存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问题，即无产阶级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来说，一国先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且没有受过民主主义训练，同时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占了劳动者的多数，资本主义发

展受到大量的封建残余的阻碍，等等。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又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这种性质的革命通过扫除封建残余，可以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因此，资产阶级有可能会支持甚至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进行这种革命，是因为需要彻底消灭封建社会的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条件。而且，只有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才能为无产阶级展开全国的阶级斗争提供政治训练。

马克思曾经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做过理论上的区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评论法国无产阶级试图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限制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时，清楚地说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黑体为引者所加。）

在恩格斯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中也可以看到上述思想：

>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中间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关于巴黎公社革命性质和具体措施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述集中于对1848年革命的总结。至迟在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提英法美德等发达国家的民主革命。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明确地说：

>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则更为明确地说：

> “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之“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巴黎公社的公社委员“几乎全部是公认的工人代表”，明显区别于劳动者联合专政的民主革命。巴黎公社的具体措施还有：公社委员实行普选权并可随时撤换，公社委员领取普通工人工资，取消面包工的夜班，取消罚款，没收流亡企业主的企业归工人协作社，免除三个月房租，等等。可见，巴黎公社在政治

上的措施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上的措施是限制资本的。

马克思对前后两个阶段法国革命性质判断的差异，是有现实原因的：其一，拿破仑三世的经济政策使得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870年法国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工业强国；其二，1871年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而资产阶级政府对外投降了。

三、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任务的论述

恩格斯在1894年撰写的《法德农民问题》更为清晰地解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提出正确的革命任务。

十九世纪晚期，法德两国的资本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城市攫取利润，而是开始向农村开拓投资空间。随着资本大量涌入农村，法德两国农民越来越难以承受资本的侵袭与殖民地廉价粮食的冲击，纷纷破产变成无产者。那些尚未破产的农民，处境也十分悲惨，他们饱受大土地占有者的挤压，甚至被迫将自己的身体与家园全部抵押给资本。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农民对自身悲惨处境的不满与愤慨，导致农民运动日渐兴起。农民运动的兴起及发展，有力确证了农民阶级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使得“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痴迷于议会选举的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为了在议会竞选中赢得农民的选票，竞相讨好农民，相继推出了一些迎合农民私有意愿和小生产观念的土地纲领。这些纲领确实迎合了部分农民的意愿与需求，似乎在尊重和保护农民的现实利益。但实际上，这些纲领如保留小块土地所有制，延续农村的雇工制度等，实际上保护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这些纲领里面还有些是实现不了的主张，比如保留小私有制。为此，恩格斯提出，在法国这样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已经发展起来了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必须要提出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以及“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主义任务，不能为了选票对农民做出实现不了的承诺；但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可以承诺革命胜利后不用暴力剥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自愿的方式建立合作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显然，这才是一个科学的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和法德农民问题的分析，对我们看待中国革命的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提出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

四、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判断的依据

列宁继承了马恩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创造了在落后国家进行新型民主革命的理论，完成了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与马恩一样，列宁在论述俄国的土地纲领的时候也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符合：

> “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1-12月）》，《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为引者所加 。）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做了清晰的判断，指出：

> “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

> 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为引者所加 。)

显然，列宁观点和马克思是一致的，那就是决定革命性质的是经济发展程度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而且列宁在这里特别强调两者是“密切联系着的”。

五、德国1918年革命和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性质以及失败的原因

《列宁道路》认为1918年德国革命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

>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列宁这段话并没有论述德国革命的性质，而是强调德国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德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却没有分开。“这是怎样造成的呢？”是因为斯巴达克派同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显然，列宁在这里是指责斯巴达克派没有尽快独立建党，而不是分析德国革命的性质。

那么，列宁有没有对德国1918年革命的性质发表意见呢？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德国在1918年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他的原话是：

> “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紧接着又说：

>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德国革命最终的结局是霍亨索伦王朝灭亡，但保留了“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结局意味着这只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德国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到失败主要是主观原因——即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得过晚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场革命有条件变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因为革命政党不正确的领

导和策略上的错误，革命走了下降型道路。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则演变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在革命中提出的口号是“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就是宣布对银行、矿井、大工业企业，运输工具和大地产实行国有化。这场革命的上升阶段强于德国，得益于革命政党领导的阶段性正确。但这场革命最终失败，也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包括对社会民主党右派的两面派面目认识不清，没有采取有力政策争取农村贫农的支持等。显然，匈牙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于德国，但这场革命因为匈牙利共产党的努力演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客观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革命任务是多层次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决定了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无论是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还是列宁的思想，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提出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无产阶级政党提出的主张一定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六、当前中国革命性质——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从马恩列三人的论述和历史经验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发展程度，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

现在，我们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性质，出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德国1918年的情况，即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有两个指标可以证明，一个是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还有一个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已经占了劳动者的大多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另外写文章论述），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还不具备，也就是无产阶级还远没有组织起来，还未出现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革命性质是什么呢？

革命性质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政治上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劳动者联合专政，经济上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继续发展。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体现在革命任务是实现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等。但二月革命之后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也并没有马上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指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一种“过渡性”阶段。在列宁看来，俄国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条件差，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特定的、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列宁认为，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执行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府，进行土地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等等（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才有可能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完成这个任务的阶段，就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在回国前夕的1917年3月，列宁在论及采取上述种种“准备性”“过渡性”措施的必要性时指出：

> “在俄国，不采取这些过渡措施（即《四月提纲》中提出的那些任务和措施，引者注），要马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采取了这种过渡措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

> 要的了。”（《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列宁也曾经讲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交叉关系，他说：

> “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68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列宁的这个观点与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曾经在1949年完成过一轮民主革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彻底的，土地以乡为单位平分给了所有农民。毛泽东反对和平土改而坚决主张斗争土改，意图唤起民众的民主主义意识以避免农民产生恩赐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民主主义的内容虽然被历次群众运动所继承和发展，但没有制度化，没有变成群众的自觉和习惯，这是当代工人阶级缺乏民主主义训练的历史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上实现的。在邓小平的计划中，原本是准备由一党专政逐步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但1989年的反抗运动使得统治阶级形成了维持一党专政作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的共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官僚专制不同于封建专制，其专制官僚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他们主导国民经济发展，掌握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且实际掌握土地所有权，通过各种方式剥削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收入，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都实际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这与沙皇专制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中国反对官僚专制制度本身就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

那么，革命的主观力量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成熟怎么办？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的观点，工业无产阶级的成熟需要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而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统治最好的政治外壳。但是，中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这个与19世纪中叶世界民主革命高潮时期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此外，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本身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掌权的国有企业官僚，私人大资本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云、王健林、王传福本身就来自体制内，他们既有对官僚专制不满的一面，又有支持官僚专制的一面。1989年私人资本问鼎政权的尝试失败后，政府通过开放股票市场、国企改制、加入WTO等方式满足了他们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从经济发展速度来说，中国要快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时候也要快于印度这样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且专制政府不允许工人成立工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因此，中国私人大资本反对官僚专制的意愿并不强烈。因此，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觉悟的提高，不能寄希望于私人大资本与官僚资本争夺政权所造成的形势，而要靠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的发展，包括取得政权前的斗争和取得政权后的政治训练。取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巴黎公社、苏维埃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具备历史进步性，首先，表现在二战之后，民主共和制对于打击官商勾结、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基本无所作为，一般表现为政治人物上台前承诺改善民生，但上台后无法兑现承诺，奥巴马的医改和泽连斯基的打击腐败都成为空头支票，其次，资产阶级民主是通过设置议题、金钱操纵的方式进行的，也不利于训练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最后，由于其会削弱集权，导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也并不能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统治形式。

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继承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政治传统，采取更为彻底的民主形式来维护无产阶级

的利益，提升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巴黎公社原则包含着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因素——普选制，又加入了随时撤换和普通工人工资制等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因此可以作为训练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源于1905年革命，是一种工人和农民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与巴黎公社是一致的。

提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国的同时提出哪些现实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内容，是我们最终确定革命性质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1917年2月前的俄国很不一样，那时的俄国还有非常多的小农，而且工业虽然形成了垄断，但垄断程度非常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以雇工50人以上的作为界定大企业的标准，相较之下，现在中国可以说是已经进入超级垄断的阶段，各主要产业都被少数几家大公司控制，形成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局面。金融资本的唯一出路就是变为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的，当大企业变为公有制企业后，中小企业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这一点与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是不一样的。1949年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民族资本家苦于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民族资本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是超级垄断阶段，私人资本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空间的。有的滴滴司机提出回到没有平台的时代，这是无法实现的主张；出租车司机提出的限制平台司机的数量，则是一个制造工人阶级分裂的主张；只有把作为金融资本的平台变为取消抽成的公共机构，才是正确的主张。

在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大规模发生，小农多数已经转变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以打工收入为其主要收入。他们的痛苦只能靠社会主义去解决，恢复集体经济或者在有条件的地方直接搞国营农场，实行免费养老、免费就医。当然，这些举措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光看是否免费，而且要看是在什么意义上实现的，因为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免费医疗实际上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保留了高端私立医院的情况下实现的。

教育是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问题，而且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现行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各种考试，完全沦为压迫人的手段，学生自杀愈演愈烈。对此，左派也必须提出相应的主张。我们认为，首先是摆脱资本对教育的控制，将学校全部转变为公立的、免费的而且由群众参与管理的机构。现在15～16岁的初中毕业生并不能出来上班，所以要延长免费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其次要改造教育的内容，由面向考试转为面向生产，特别是要将高中改造成综合技术教育。这里可以借鉴克鲁普斯卡亚的综合技术教育理论。最后要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借鉴文革时期的历史经验，即应届高中生毕业工作两年后才能去考试。待公有制完全确立后，应该取消高考，由单位派出人员去大学学习。

总之，中国革命面临反对专制制度的任务，但取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内容具有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性质。政治上贯彻巴黎公社原则，经济上实行群众监督下的托拉斯制度，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政治训练，为建立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进行准备。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全面分析经济的发展程度，提出无产阶级在准备阶段的主张。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尝试概括以下几点主张：

第一，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取消特权，严惩腐败。

第二，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公民权利。

第三，现有国有企业合并成各个行业的托拉斯，降低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取消各种个人缴纳的保险费用，由国家设立社会保障基金支付所有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第四，没收民营垄断企业变为公共平台，取消平台的抽成。

第五，工人组建工会，民主管理工厂，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底薪至3000元，禁止两班倒、三班倒，真正落实五天八小时工时制，取消非应急行业的夜班，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步缩短劳动时间，保证工人阶级有时间参政议政。

第六，学校全部为公立的、免费的而且是群众参与管理的机构；免费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高中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后勤部门由承包改为直营，接受群众监督。免除大学学费。

第七，社保医保费用由国家承担，农民年满60岁，每月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养老金。

第八，免除房贷和取缔高利贷。

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并不意味中小资本会被暴力剥夺，也不意味着不允许小资产阶级说话。巴黎公社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采取禁锢小资产阶级言论的措施，马克思所指责的只是巴黎公社没有封闭凡尔赛匪帮的报纸。中小资本是受到大资本控制的，在中国并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在金融资本被国有化之后，很快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是其准备阶段，这种准备有别于民主革命的准备，而是类似巴黎公社和俄国二月革命之后那种准备。共产主义者在这场革命中应该要坚持反对专制制度，但取而代之的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国。这些过渡性政策实行之后，革命政府将会得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拥护。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实行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收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另外，我们建议现在应该从较为抽象地讨论革命性质转变为具体地讨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后者也许更有意义，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现实基础之一。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